

徐霞客结怨桂林拓工

■鲍刚

清末金石学家叶昌炽曾评价说“徐霞客好游，而不知网罗古刻；近时陈董斋好古，而深居里门不出，此古今一大憾事。”说的是徐霞客喜欢实地考察，但却不注重收集金石文字，笔者认为叶昌炽的话有失偏颇，从《徐霞客游记》，特别是《粤西游日记》来看，他是很留意搜罗碑刻的，还与桂林拓工留下了一段恩怨故事。

徐霞客未能如愿 拿到好拓片

徐霞客于崇祯十年（1637）四月（农历，以下汉字日期均为农历）末进入桂林，除了探寻岩洞之外，还花了大量时间搜集各处碑文，主要采取抄录的方式，对于特别心仪的碑刻，则觅工拓印。五月十九到南门桥寻找拓工打算拓印水月洞碑刻，结果拓工不在家，第二天徐霞客打算去阳朔，在等船的过程中，派顾姓仆人再去寻拓工，并与拓工一同前往水月洞，告诉了需要拓印的碑刻，预付了纸张费用，希望从阳朔回来后能拿到拓片。

八天后，徐霞客回来，拓工基本没拓，徐霞客催促拓工抓紧，二十九号，再次让仆人去催，三十号让静闻和尚前往水月洞监工，六月初一，徐霞客拿到拓好的《陆游诗札》，发现少字，要求重拓，结果反不如前，如此反复，直到初八要离开桂林了，才拿到拓片，还是“拓法恶滥”的残次品，徐霞客只好无奈接受现实，对这里的人留下了狡猾贪婪的坏印象。为了收集拓片如此执着，怎么能说不好古。

徐霞客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却透露出关于桂林石刻传拓的两个重要信息。其一，桂林当时有专门的拓工，但掌握传拓技法的人很少，徐霞客从始至终找的是同一人，这说明当时桂林拓工极少。第二，天气对桂林石刻的传拓有很大影响，徐霞客未能如愿，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因为天气不好。农历五六月间，桂林正是湿热的天气，降水量大，南风天严重，从徐霞客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从四月二十八入桂林城至六月初十离开（去阳朔8天），期间桂林有十几天都在下雨，即便不下雨，也是湿热，这样的天气，岩洞石壁往往都是湿漉漉的，纸张贴在石刻表面无法干透，这样的情况下，要么拓碑工作无法进行，即便能做，拓片的质量也较差。

桂林石刻传拓技艺 进步巨大

今天，桂林石刻传拓技艺在历代文博人特别是桂海碑林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果，于2016年11月被公布为第六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韦可祥入选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

在桂林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桂海碑林博物馆多年来坚持收集



徐霞客（资料图）

整理桂林石刻资料，如今已经完成了桂林诸山超过90%的摩崖石刻拓片采集工作。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桂林石刻主要分布于悬崖峭壁之上，体量大，距离地面高，环境危险，需要架设脚手架才能完成采拓，高空作业是家常便饭。位于独秀峰的摩崖石刻“南天一柱”，高11.08米，宽3.1米，碑刻本身就有4层楼高，脚手架的高度超过20米，相当于7层楼高；伏波山《张庄撰崇宁新建平允从州城寨记》则是背山面水，高度也超过20米，脚手架要从漓江中搭起。同时，这项工作对天气的要求比较高，桂林地区一年中适合时间只有秋冬不到3个月的时间，此时的桂林往往又是北风呼啸，沁入骨髓，用古人的话讲“重裘不暖”。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对野外石质文物的保护，目前尚无有效的办法，通过拓片采集，精准保存石刻信息，石刻以拓片的形式流传、展示，是石刻生命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正是有了拓片资料的支持，在桂林文博前辈谭发胜老师等人不懈努力下，由桂海碑林博物馆编，谭发胜等人编撰的《桂林石刻碑文集》在2019年年底出版，这是自清代《粤西金石略》，上世纪70年代末《桂林石刻》（三卷本）之后，桂林石刻文献一次重要的整理，其文献的丰富性和准确性均超过前两次，为今后桂林石刻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假如徐霞客再生的话，他来桂林就不必再亲自动手抄录碑文了。不过，他想要拓片也还是不能如愿，因为法律不允许！

康有为两次来桂林讲学

■张金武 文/摄



康有为讲学处遗址

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貽，后改名为有，字广夏，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戊戌变法运动的著名领袖。毛泽东称其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

在叠彩山景风阁讲学40天 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清光绪20年（1894年）12月，康有为以孝廉身份，带着变法维新思想首次来桂林，在叠彩山风洞前景风阁讲学40天。当时拜康门受业的，有王浚中、况仕任、龙焕纶等广西知名人士。康有为以《春秋公羊传》《荀子·非十二子》为讲学内容，撰写《桂学问答》讲义，系统讲述了孔子之学是什么、为什么要学、如何去学和在学习的过程中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问题，目的是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当时，康有为以行楷字在风洞口刻有题记：“光绪甲午之腊，南海康长素以著书被议，游于桂山，居风洞月余。”

以维新派领袖身份再次来桂 重驻景风阁讲学

1897年正月至六月，康有为以第八名进士、工部主事身份，发起公车上书，并以维新派领袖身份再次来桂，重驻景风阁讲学。两次均由桂林名士龙泽厚等安排、接待。

这次来桂，情况和第一次大不相同：甲午战争后清廷腐败，国家积弱，国人深感其辱，中国社会普遍酝酿了改革图强的氛围，康有为振臂疾呼，众人纷纷响应，门生故旧趋之若鹜。当地士绅，如回桂林隐居的台湾

巡抚唐景崧，弃官闲居的岑春煊，主持桂林军政的蔡希邠、史淳之等人对康讲学均给予一定物力、财力支持。

康有为编撰了《春秋义》《春秋考》《日本书目志》，创办了广西第一所学校广仁学堂，课程为经学、中西历史、地理、《宋元学案》、《朱子语类》、《公羊传》等。学生每日做札记或写游记、日记，并参加听讲、学习礼仪。三月七日，康有为在西华门外西粤广仁善堂创办广西第一个学会“圣学会”，培养变法维新骨干，介绍西方科学文化，主讲《春秋公羊传》《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篇》《墨子》《史记》《宋元学案》等，重点对学术源流、政治革新趋势及《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进行讲解。康有为还创办了广西最早的民办报纸《广仁报》，初为两日刊，不久改为周刊、旬刊、半月刊，最后为月刊。报纸36开，木刻直排，土纸印刷，线装成册，公开发售。内容有论说、时事、地方要闻、中西译述、杂谈、短评等，多议论时政，宣传变法图强，激发民族自尊心，鲜明提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转变广西的士气民风多有影响。

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康有为流亡海外，圣学会被取缔解散，《广仁报》被封停刊。然而，康有为培养了大批变法人才，其新学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桂林文化教育从旧学走向新学，影响了很大一部分桂林进步学者，在广西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